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新进展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and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第 1 辑)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新进展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and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第 1 辑)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新进展 /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303-14365-8

I. ①职… II. ①北… III. ①职业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7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7427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755 58800035
北师大出版社职业教育分社网 <http://zjfs.bnup.com.cn>
电子信箱 bsdzyjy@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5 mm × 250 mm

印张: 13.75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策划编辑: 王 婉

责任编辑: 王 婉

美术编辑: 高 霞

装帧设计: 高 霞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新进展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and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第1辑)

编者：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白 滨 庄榕霞 李兴洲 和 震
周慧梅 赵志群 俞启定

执行主编

李兴洲

前 言

职业与成人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职业与成人教育的历史,反思职业与成人教育的现实,探索职业与成人教育的未来,是每一位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者的“功课”。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一直致力于这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针对这两个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我们一直有一个理想,即按照国际学术惯例和规则,创办一本学术性的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刊物。然而由于种种限制,这个设想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随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成立,以及“211”和“985”等学科建设工作的推进,我们觉得有责任去努力实现这个愿望。经过大家的讨论,我们决定今后每年出版一本《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新进展》集刊,选编或发表这两个学科该年度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求反映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本书是这个系列集刊的第一辑,主要内容有:

第一,对我国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是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俞启定的“论中国近代从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型”,在对中国教育历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阐释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画卷。周慧梅对20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教育制度建设”的考察,从域外观念与近代中国学制变革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为认识和研究我国成人教育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周慧梅关于我国古典戏曲在科举社会中的娱乐与教化功能所作的分析,透视出科举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强大的渗透能力,以至于民间的戏曲娱乐活动都被赋予了科举教化的功利目的。这种古代的成人教育形式对于我们今天的成人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二,对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坚持不懈的研究和探索,是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重要特色。赵志群的“关于职业教育研究方法以及若干理论研究课题的思考”,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若干在职业教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但是对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具

有很强“职教特色”的理论研究课题,如职业研究、职业能力研究和职业资格研究等,并对职业教育研究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揭示其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职教研究的意义。刘洋与和震关于职业能力研究进展的综述,从国外关于职业能力的概念界定、构成研究、职业能力形成过程理论研究和培养实践探索等方面进行分析,为我国探索职业能力培养规律提供了更多的借鉴和参考。杨琳和赵志群对我国职业院校学生职业道德发展状况的诊断研究,依托中德合作科研项目,对我国职业院校学生职业道德发展状况进行大尺度诊断(large-scale diagnostics)分析,发现我国职业院校学生尚无法区分职业认同感与工作道德、职业承诺与组织承诺;以及不同学校、专业学生的承诺和职业道德之间所存在的显著差异与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学习内容和实习企业的工作安排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研究方法为我国的职业教育研究和职业教育管理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第三,对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政策的分析和研究,集中体现了教育科研观照教育现实发展的研究旨趣和学术追求。庄曼丽和李兴洲关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政策执行失真的分析,阐释了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就业导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失真表现,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探索减少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办学方针政策执行失真的对策和建议,有助于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政策更好地贯彻实施。李兴洲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政策走向的分析,认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高投入的高等教育,我国目前的高等职业教育还处在相对比较低的发展层次和水平上,这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有较大的关系。在分析我国出台的一系列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探索问题的成因,并对将来的政策走向作出预测。这种分析和预测将有助于破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难题,有利于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和震和霍丽娟关于制定和实施校企合作促进政策的多视角分析,从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学生的视角分析了实施和制定校企合作促进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了各方的政策诉求,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对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制定与推进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第四,关注成人教育,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我国成人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不断推进成人教育的发展,是促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庄榕霞和王钢的“成人学习者远程学习适应性研究的思考”对学校远程教育中成人学习者学习适应性研究的现状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应注意从多角度、多层次来理解和研究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适应性;在远程教育中,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来分析和强调成人学习者与远程教育院校之间的彼此主动适应;在远程教学中,可以从内外两方面以及观念、制度、活动三层面对成人学习者远程学习适应性作结构化理解。在提高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适应能力方面,除了学习者自身的努力外,还应注重远程教育院校对学习者的引导和帮助;注重通过学习者与他人(包括老生在内)

的全方位的人际往来提高其适应能力。白滨关于我国网络教育培养目标的质性研究,对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和网络学院系统的从业人员进行半开放式深度访谈,解释了专业人员对现行网络教育从学术型人才目标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转型的普遍看法,进而揭示出网络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内涵,指出未来网络教育的发展方向是职业继续教育,网络职业教育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对我国当下广播电视大学和网络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第五,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是不断促进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研究和探索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质量和效率,是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庄榕霞和赵志群关于《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课程标准》的开发研究,通过对现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现状及在职教师对理想的培训课程的期望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与工作过程相关”是中职教师资格课程标准的核心特征;利用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法(GAB)和实践专家研讨会(EXWOWO)确定了中职教师职业的典型工作任务,并确立了中职教师培训课程的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目标、课程门类和课程内容,探索建构了一个学习领域的课程体系。这对我国职教教师职业专业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六,关注国外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动向,吸取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为我国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一直是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目标和学术追求。白滨关于英国开放大学外部质量控制的质性研究,以英国开放大学的专业人员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开放大学高质量水准的外部因素为切入点,使用质性研究工具 Nvivo8.0 对访谈内容进行话语分析,揭示出影响和控制英国开放大学质量的外部影响因素,对我国开放大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李宜嵘和俞启定翻译的美国教育专家 M. A. 吉欧·加嘉的关于尼日利亚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文章,从尼日利亚教育实际和社会经济状况出发,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尼日利亚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共同关心的问题、焦点和新趋势,其中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可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

以上文字体现了我们在各自研究领域所作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成果,可能离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以及与职业和成人教育发展的现实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督促我们不懈努力的动力。我们不甘简陋,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所期盼的,让更多的同仁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指导,以利于我们更好地前行。

目 录

1	论中国近代从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型 / 俞启定
22	域外观念与中国学制变革——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教育制度建设”的考察 / 周慧梅
35	关于职业教育研究方法以及若干理论研究课题的思考 / 赵志群
45	职业能力研究进展综述 / 刘 洋 和 震
74	成人学习者远程学习适应性研究的思考 / 庄榕霞 王 钢
84	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政策执行失真及其矫治 / 李兴洲 庄曼丽
93	困境与对策：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政策的多视角分析——关于制定和实施校企合作促进政策专题的调研报告节选 / 和 震 霍丽娟
110	学术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型——我国网络教育培养目标的质性研究 / 白 滨
120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政策走向分析 / 李兴洲
135	对我国职业院校学生职业道德发展状况的诊断研究 / 杨 琳 赵志群

- 148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课程标准》的开发研究 / 庄榕霞
赵志群
- 163 娱乐与教化:古典戏曲中的科举社会 / 周慧梅
- 178 英国开放大学外部质量控制的质性研究——专业人员的
视角 / 白 滨
- 192 尼日利亚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21 世纪职业教育的问题、
焦点以及新趋势 / 李宜嵘 俞启定

论中国近代从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型

俞启定^①

摘要：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新式学校是一批专业技术学堂，衍生出实业教育体系，在1904年癸卯学制中正式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实业教育的目的是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体现国家本位。民国建立后，更加体现民本、民生理念的职业教育开始在教育界得到弘扬，到新文化运动期间成为关注热点。由陆费逵肇端，陈独秀、恽代英、蒋梦麟等特别是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性质、目的以及实施原则和方法做了精辟阐发，强调其促进个人就业谋生的根本目的。其间教育界致力于新的职业教育制度的设计并付诸实践探索，最终体现在1922年学制中。新学制采用职业教育的正式称谓，将职业教育渗透到普通中小学教育之中，同时举办专门的职业学校，确立并高度凸显了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 实业教育 职业教育 转型

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很有国情特色，就是国人自办的新教育，既不是从小学开始再向上递升，也不是从大学开始再向下覆盖，而是从相当于中等技术教育的领域切入的。在这个新式教育领域又经历了称谓概念的演进：早期是个案兴办一些专业技术学堂，清末学制颁布时统称实业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构成部

^① 联系作者：yuqd@bnu.edu.cn

分；在1922年学制中又更名为职业教育。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并非单纯的概念变换，而是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的。在这个变更过程中涉及的形势背景，有关职业教育性质、目的及兴办原则的理论碰撞和实践探索，都是很值得研究和具有现实借鉴价值的。

一、晚清从专业技术学堂到实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鸦片战争开始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进程，也向中国展示了“船坚炮利，工精器巧”的先进军事力量。林则徐的好友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①的主张，但当时尚未引起社会重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后，清政府中一些当权者方痛切感到，当务之急是要引进西方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建立起近代化的国防事业，于是产生了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新式军工企业为主的“洋务运动”。要创办新式工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不可缺少的，必须有培养培训这类人才的学校，中国近代首批新式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办的。

（一）近代早期的新式技术学堂

学界普遍认为国人自办的近代新式学堂始于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其实它起初只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其性质与清代早已举办的俄罗斯文馆、四译（会同）馆等翻译学校并无不同，1867年之后才增加近代科学课程。近代最早兴办的专业技术学校当属1866年年底左宗棠奏请在福建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设有船舶制造和驾驶两大专业，分别采用法国和英国的技术，并聘请该国的师资和技术人员主持教务。又设有“艺圃”（培训技术工人的机构），从各厂招收艺徒百余人，随聘请的洋技工学习识图、制图和计算，以达到在各自所在车间的操作要求。福建船政学堂是按西方模式办理的第一所近代技术学校，所以被视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开端。

此后，洋务派兴办了一系列的专业技术学校，包括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1867年）、福州电器学塾（1876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电报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等，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新式学堂。这些新型技术学堂的设立都是搞洋务的官员申报朝廷批准后兴办的，属于个案处理，也不归属于当时的教育管理体系，在当时的国家教育体制中尚无一席之地，只能算做是封建传统教育之外的点缀和补充而已，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历程。

（二）实业教育在近代教育体系中的确立

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再次遭到屈辱的惨败，变法维新的浪潮涌起，全面创

^① 《海国图志》序。

建近代教育体系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戊戌变法期间,朝廷下令筹办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于是因袭日本的称谓,总括为实业教育。虽然变法被扼杀,但已奠定了实业教育进入教育体制的基础。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施“新政”,开始构建新教育体系,于1904年1月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近代学制。该学制与普通大中小学堂并列有高、中、初三级实业学堂,还有补习教育性质的实业补习学堂、艺徒学堂以及大学堂附设的实科、培养实业学校师资的实业教员讲习所等。

以往洋务派兴办的技术学堂侧重于掌握新式企业生产所需的知识技术,是为雇主提供合格有技能的劳工服务的,因此应视为企业行为居多。而癸卯学制规定办实业教育的目的是“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①。可见实业教育是着眼于国计民生的总体发展。因此必然是政府行为。实业教育的专业主要是依产业划分的,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大门类,其下则以行业分类,覆盖面相当广。实业教育并未着眼于考虑个人对职业的需求,可见与现代意义上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仍有区别。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正式颁布《学校系统令》,次年又陆续公布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法令规章,形成新的学制系统,统称“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仍沿袭实业教育体系,只是将原初等实业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分别改称甲种实业学校和乙种实业学校,将原高等实业学堂改为专门学校(即专科),属于高等教育而脱离实业教育体系,这样,实业教育就被定位在中等以下层次。

二、民国初年职业教育的酝酿

(一)职业教育思潮的兴起

清末兴办近代新式教育主要是仿效日本学制,包括实业教育的称谓,而西方并不使用实业教育的概念,欧美早期多称技术教育,例如英法两国19世纪后期都设立了技术教育委员会,英国于1889年颁布《技术教育法》(Technical Education Act),德国设有多科技术学校(Polytechnische Schule),美国也有“闵斯尔多科技术学院”。德国同时强调职业补习教育,1869年颁布《强迫职业补习教育法》,成为职业教育概念的先声。被誉为德国职业教育之父的凯兴斯泰纳(Georg Kerchensteiner)信奉歌德的名言:“真正的教育只有通过职业教育才能完成。”他指出:“公立学校(包括国民学校、继续教育学校和高年级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

^①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湖北学务处,第1页。

要发展职业教育，或者说是就业前的准备教育。”^①日本在使用实业教育的官方称谓的同时也使用职业教育的概念。19世纪90年代的文部大臣井上毅强调：“要想发展国家的富力，必须首先改革和发展实业；而欲改革和发展实业，则必须振兴职业教育。”^②中国清末兴学时虽然以实业教育为正式称谓，同时也有人提及职业教育。

1902年，山西农林学堂开办，总办姚文栋在1904年撰写的《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指出：“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承而不相背。”认为与民众直接相关的就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是整个教育的两大基本类别。谈到开办学堂的指导思想时，他明确提出：“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业，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③他在派送本学堂学生出国留学时告诫他们：“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尔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阙一不可。”^④姚氏所说的职业教育与当时实施的实业教育并无区别，但更侧重于民本的意图已然呈现。

民国建立之初，在教育领域只能顾及根本方针及重大的问题，还来不及涉及诸多具体领域的改革，因而暂时沿袭了前清学制的基本框架，包括实业教育体系。但国家政体的改变必然影响到教育思想的转变，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民生的需要，赋予新的意义的职业教育理念也开始出现，它产生的背景可以概括为现实需求和理论导向两个方面。现实需求体现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上对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劳工地位的提升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导致对新的职业教育的注重，理论导向则主要出自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一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卷入战争漩涡和战后的恢复而无暇东顾，一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就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例如纺织业，1917—1919年全国进口棉纱总数为1913年的59.2%，1920—1922年下降为48.7%；1917—1919年进口棉布总数为1913年的58.7%，1920—1922年下降为33.7%。外国进口的大幅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大批民族资本家投资棉纺织业。1914—1922年9年内，纯由民族资本所开设的纱布厂共54家，仅1920—1922年内开设的就达39家，三年超过战前20余年中外人开办纱厂的总数。机器制造业1914—1924年的十年

① 郑惠卿译：《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② [日]井上毅传记编纂委员会编：《井上毅传》史料篇（五），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75年，第463页。

③ 《添聘普通教习详文》，《山西农务公牍》第1卷，第13页。

④ 《送农林学生崔潮等游学日本文》，《山西农务公牍》第5卷，第32页。

间,仅上海一地民族资本机器工厂由 91 家增至 284 家,期内除停业者外,新开办 193 家。

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发展成繁荣的工业中心,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形成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吸引江南农村人口大量向这些城市移动。据统计,1913 年以前,中国纺织、食品、印刷文具、机械五金等十个行业的近代工厂总数为 698 个,工人总数是 27.1 万人;到 1920 年,工厂总数增至 1759 个,工人总数增至 55.8 万人,七年间,厂数、人数均增加一倍以上。

大批近代企业的出现,不仅在数量上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在质量上也对员工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训练提出新的标准和要求。其间使用机器等设备的大工业发展迅速,1914 年,工业投资资本在 5 万元以上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 23%,到 1920 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 45%。由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过程的分工进一步细化,产业工人也形成了小工、大工、技工、技术员和管理层职员等多个工级,在技术要求上有不同的层次,如技术员和管理职员除必须掌握基本生产技能外,还需要掌握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工程制图、工序设计、质量检测和成本核算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生产技术,而接受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和训练是获得职业提升的重要途径。民族企业除了依靠聘请外籍人员和归国留学生的办法担任高级技术人员外,在培养更多的中、下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乃至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人、职员、店员方面,则愈来愈寄希望于国内教育界。

而在当时,无论是普通学校还是实业学校,其培养目标和学习内容、教学方式都不能很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如蒋梦麟所批评的:“新事业需要灵活之子弟,吾国之教育则重循规蹈矩。新事业需思力,吾国教育则重记忆。新事业需适应力,吾国教育则重胶固之格式。新事业需技能,吾国教育则重纸上谈兵。”^①这个新事业,也就是体现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因循旧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或是沿袭传统的升学主义,不愿中途而废,也不屑于从事低层次的工作;或是因为缺乏一专之能、一技之长而无法被录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普遍。正如曾创办上海厚生纱厂、发起组织华商纱布交易所的企业家穆藕初所感慨的:“在失业者方,嗟叹活计之难寻;在事业界方,忧虑需要人才之无多。”^②胡适在《归国杂感》中也有同样的感叹:“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企业用不上合适的人

① 《职业界之人才问题为教育界所当注意者》,《教育与职业》第 2 期。

② 《穆藕初先生演说·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教育与职业》第 7 期。

才，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出路，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尖锐的矛盾驱使社会有识之士认真思索改革教育的问题。

（三）劳工地位的提升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

由于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早期的工人阶级队伍，在国民生产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封建时代重士农、轻工商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同时也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工人运动高涨的影响，广大劳工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对象。“劳工神圣”的口号率先由蔡元培提出，并满怀激情地鼓动：“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①此后很多报刊上都出现了《劳动专号》，呼吁关怀劳工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们的教育。

伴随劳工地位在社会意识中的提升，此时也是平民教育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当时成立了各种平民教育社团，尽管各派平民教育的具体主张各有侧重，而共同之处都是强调平民的受教育权利，打破少数人独占教育的特权，要使普通平民获得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指出平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要有公德心。”^②他提出的乡村建设中开展的“四大教育”，即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其中的生计教育，就是“要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换言之，要从生计教育着手，以达到农村的经济建设”。^③以上各种教育活动和相应的思潮都是面向平民特别是面向劳工为主旨的，其重要特点就是从传统的“以国为本”转向“以民为本”，虽然最终也是要救国、强国，但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的，是首先关注民众生计，为他们谋福利的，这就为新的职业教育的开展奠定了立足点。

（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先导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本着救亡图存、强国裕民的目标，以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为基本手段，在对封建传统教育空疏陈腐、脱离实际、封闭呆板的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崇尚实用是近代教育推进的基本思路和行为准则，到民国初年，进而形成实用主义教育观，伴随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更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支配着这一期间的教育改革。

1913年10月，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他指出自兴学以来，学校普遍设立，入学人数益多，然而效果不佳。学生虽然有了一些文

^① 《劳工神圣》，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19页。

^② 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③ 詹一之：《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12页。

化知识,但是不切实用,既不能为国家做贡献,也难以为个人谋生计,反倒养成眼高手低、好逸恶劳等不良之习,甚至“厌苦家庭,鄙薄社会”,这是教育偏离正确方向的恶果。他提出:“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从实用主义的立场看,教育就是为个人立身处世培养必要的知识技能的,“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这里已不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只是强调教育要切实实地为现实生活服务。

当时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学者庄俞也予以积极响应,他呼吁:“欲救今日教育之弊,非励行实用主义不可。”^①在他们的引领下,教育界掀起了一股推崇实用主义的热潮。当时的主要教育刊物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研究》等都登载大量相关文章进行研讨,一些学校也注意增加与实际生活密切联系的教育和训练内容。实用主义教育“于民国二三年之间,蔚为一种思潮,流行全国”^②职业教育本来就是实用型教育的集中体现,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必然成为提倡职业教育的先导。如黄炎培所说,二者的关系是“义非两歧,道实一贯”^③。

随后便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传入中国。杜威学说及其改造传统教育的所谓进步教育运动当时不仅在美国、也在世界领域产生巨大反响,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民国建立后大批留美学生学成归国,很多人在教育界任职,致使美国教育在中国的影响剧增。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的一批中国学者,更是受其学说的影响,回国后自然将这种影响带入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杜威的一些重要教育观点,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几乎成了教育界的口头禅。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促进了职业教育思潮的发展。

(五)民国职业教育思潮的先驱——陆费逵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近代出版家,时任《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早在1911年就提出:“吾国今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④就是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三大现代教育类别。陆费逵在1913年年底考察江苏、山东、直隶三省教育,感到小学确是渐见发达,但学成后不能臻于实用。于是他感慨说:“无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则国民教育即使普及,亦不过增无数识字之游民而已。”此说当然有些极端,兴学当有先后次序,基础教育不先发展,职业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学生就缺乏来源,但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比例失调的问题还是需要重视的。

① 《采用实用主义》,《教育杂志》5卷7号,1913年。

②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第148页,中华书局,1929年版。

③ 《职业教育析疑》,《教育杂志》9卷11号。

④ 《世界教育状况序》,《陆费逵教育文存》卷5,中华书局,1922年版。

陆费逵对职业教育的定性和强调职业教育的作用是很到位的。他指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所以使中人之资者各尽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也。”并强调：“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①陆费逵不仅看到了职业教育兴盛对促进实业发达的作用，而且提出职业教育应以授人一技之长为主，这成为后来职业教育思潮的重要内涵。

三、新文化运动期间对职业教育的倡导

20世纪初到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以后思想战线的革命运动。它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操，以“民主”和“科学”为两面大旗，猛烈荡涤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同时掀起教育改革的浪潮，旧的实业教育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向新的职业教育转型。

（一）注重教育与职业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引领者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科学）；二是惟民主义（民主）；三是职业主义，四是兽性主义（军国民）。他批评我国从来轻视实业，“功利货殖，自古为羞”，结果是国家贫弱，百姓困苦。因此，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进入“植产兴业之社会”，达到国强民富的目标，就必须在学校教育中提倡职业教育。他指出：“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②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撰写《学问与职业一贯论》一文，认为中国“百业疲弊”、“学术荒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问与职业不能一贯，故学问职业两无关系，不能互相助益也。”他看到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造成的：“吾国人重文轻实之弊，垂数千年，其所读之书，所受之教育，每与职业一无关系。”他指出，学问与职业分离，至少有四大危害：第一，世人知学问与职业毫无关系，则大多数为生活学习技能的人，不复求学；第二，学问因得不到实地应用的机会，则学者易于受伪学的欺骗；第三，学者无实学，也就无谋生之能力，故社会地位就低；第四，学生无正当能力，“为救死计”，或阴险倾轧，或交接承迎，使社会信仰学问学者之心，一去而不可挽回。恽代英由此得出结论：“职业与学问之一贯，不但所以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进步，亦且为救陷溺之人心，亦且为救危亡之国家唯一方法。”^③要使学问与职业挂上钩，首先要树立求学是为了“应生活之需要”的动因。其次，要以“求学以供社会需要为目标”。只有“注重

① 《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陆费逵教育文存》卷1。

② 《今日之教育方针》，《独秀文存》卷1，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③ 《恽代英文集》（上），第258页。